

【美】杜赞奇 著
王福明 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本文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对“龙王”、“关帝”等象征符号与权力间的复杂关系作了条分缕析的评论，认为如因现代化发展过快而导致彻底摧毁传统，终将会出现使社会发展停滞这一与人心相悖的状况。

【美】杜赞奇 著

王福明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雷 颐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文化、权力与国家
著 者 [美]杜赞奇
责任编辑 孙 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江浦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2
印 数 5541—10575 册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70—7/G·315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0032/04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从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年

中文版序言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译为中文出版，我甚感荣幸。此书英文版出版以来，已近5年。其间通过公开的商讨和私下的谈论，使我获益匪浅。在此，我想进一步阐释书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词。自然，这里的阐释也反映出我现在的思路和看法。不过我确信，这些思路和看法在本书中已有所流露，而反思则有助于更好地阐释它们。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尽管“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有时与现代化进程相连，但它同时强调的是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它同更为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但我们对此却研究甚少。我试图以发展中国家，如过去的中华民国为例，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内卷化”^{*}，来进一步探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这在第三章中有详细论述。

在英文版前言中，我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作了比较，用以说明19世纪末以前完成“建设”任务的近代国家与20世

^{*} “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定义，见本书第三章第68页。译者注。

纪初的国家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在我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它可以被称之为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代解释，我将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很显然，这一基础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本书对意识形态问题只简单提及，但这并不否认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理解中国及东亚政权作用、而且是理解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软弱的关键。

对比之下，书中的另一重要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则更为接近后现代化思想。通过这一概念，我力图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作为一种趋势，当代文化研究也反对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权力的文化网络”赞同以上论点，它反对一些现代化论者用单一社会体系或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去理解中国的观点。同时，它也反对认为价值观点交互感应的功能主义论者的学说。我认为，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也许，第五章中关于关帝的讨论能更好地说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为了方便中国读者，在此，我简略地说明一下书中几个名词的含义，这些词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在第二章中，我讨论了乡村统治中的“经纪模型”。在英语中，“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另一类

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另一组名词，如“象征增添”、“象征盗用”或“霸权意识”等（见第二章），其英文含义同中文含义一样，比较模糊，因为它们是指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描述客观的事物。简单地说，我用“增添”或“盗用”来形容一个群体——不论是国家还是农民——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一偶像或符号，但却赋予该偶像或符号以新的含义。至于其他群体是否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新的含义或解释，则依不同环境而定。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是从人类学意义上用“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词的，它是指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这一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奉该庙中的神灵——所界定。在第七章，我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探讨了“村界”问题。

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我很感谢译者不辞艰辛地翻译此书，并衷心希望以上简单的阐释和说明有助于理解全书，且未妨碍译者的遣词用句。

杜赞奇

1993年春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前言 1

- 第一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13
- 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37
- 第三章 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52
- 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81
- 第五章 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111
- 第六章 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148
- 第七章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183
- 第八章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205
- 结 论 233
- 后 记：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246
-

引用书刊目录 252

前 言

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 1
意,它们使此一时期的中国有别于前一时代。第一,由于受西方入
侵的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
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本书将研究第二个变化,即
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是 20 世纪之后的事情,随着大规模的铁
路修筑,各区之间经济交流加强,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二、三十年
代华北平原、特别是对那些历史上种植经济作物以及新近引入经
济作物的区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①。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
入侵对华北经济变化的影响是有限的。马若孟(Ramon Myens)和
黄宗智对华北农家经济的研究均说明,这种入侵并未改变这一地
区小农经济的本质^②。

不过,自 20 世纪之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到 40 年代时
却使华北乡村社会改观不小——事实上,它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
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国家权力企图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努
力始于清末新政。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与近代早期的欧洲相似, 2
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和其他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国家政权建
设(State-making)”^③。其相似之处包括: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
(bureaucrat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

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

蒂利和他的同事们严格地区分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的不同。18世纪欧洲的“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蒂利等认为欧洲各国的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④。

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1)为挽求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⑥。所有这些因素都汇合起来,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权。

3 与现代化和民族形成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国家权力的扩展,预示着20世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道路与18世纪的欧洲不同。在欧洲,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形成,而且是国家塑造的动力。对1870—1970年间国家宪法的研究表明,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同时,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也在扩大^⑦。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替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从国家财政收入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可以看出此点)®*。

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

这些新行政机构对乡村的领导构成和村财政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清末新政要求村庄建立一套财政制度以资助兴办新学堂、新的行政组织和自卫组织。而且,国家开始不断地向农村摊款,先是支付巨额赔偿,后来用来支持无休无止的混战。所有这些摊款很快便超出田赋的数倍。摊款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过去的其他捐税,它不是按丁口或私人财产分配,而是按村庄为单位分摊。由村庄制定自己的摊款方式,从而使村庄具有征款权力进而发展起了村庄预算。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公共事业的扩大,为监督这些新事物并分派、征收摊款,新型的村庄领导组织亦得到加强。本书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将对 20 世纪前半期村庄领导层地位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⁴

这一时期地方领导层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而是来自外界的强求。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政府培养一批地方领导来实现国家的目的。为了避免社会和法统危机,这一地方领导层的重建

* 顺便提一下,这正是华勒斯蒂所提出的在后殖民地时代的边缘地区弱小国家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

必然先于近代政权对传统权威的破坏。*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旧的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由以上问题不难看出，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我们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这里所用的“权力”(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⑤，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一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

人们往往重视被他们直观地认为是社会生活重要方面(如财产关系或政治活动)的研究，与此不同，为避免“先入为主”，我将先考察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我将揭示这些权力关系，如宗教或庇护(patronage)是如何影响乡村公共权力的施展。这一公共权力包括规定村民的权力和义务、决定乡村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概括地说，我将通过考察小到一家一户，大到数个村庄之间的组织与联系，来分析乡村权力关系。对这种权力关系，我统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

* 我所说的“现代化”或“近代化”，是指近代国家形成，是作为客体，而不是分析的工具。

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换句话说,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这是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

在第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在该章以及后面的“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各章节中,我将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灭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6

资源来源

我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后简称《惯调》)。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两省六县六个村庄的情况。反映华北农家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特别是黄宗智一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看看黄宗智之书的第二章。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据满铁调查员旗田巍和小沼正告诉我,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作为殖民统治者代表的调查员怀有疑虑,

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被访问的农民性情古怪造成的(1981—1982年东京访问)。小沼和旗田都告诉我,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要零摘碎取。

在阅读这六卷本资料时,我找出一种验证这些材料是否准确的方法。在不少场合下,日本调查员对一批人进行采访,向许多人提出同一个问题,所以,通过广泛阅读这些回答,我可以用其他人提供的回答来验证某一材料。反过来,通过精读某一农民提供的材料,熟悉该人,亦可以判断其材料的真伪。而且,在《惯调》的某些卷中,三分之一的资料是原始记录,如碑刻、契约和村庄向县衙的禀状,用这些中文材料既可以再现历史事件原貌,又可以检验访问材料的真伪。如此便可以去伪存真,以了解乡村社会的实况。

除《惯调》材料之外,我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我主要依据的是中文材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在方显廷的指导下,该研究所培养出了像冯华德、李陵那样的杰出学者,他们对华北乡村作了扎实的研究。我发现他们对河北县级及下层财政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根据1986年我对南开大学访问时与该所农业经济学家谈话的印象,我觉得南开至今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

华北平原的村庄

华北平原村庄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末元明交替时期。明太祖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残杀,不少村庄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推翻元朝之后,明太祖(1368—1398)大力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⁸。